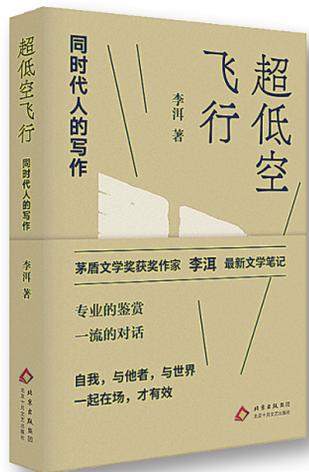


重点推荐



《超高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李洱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2月

“一定要与时代保持紧张的对话关系”，李洱在《超高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的“代序”中写下的这句话，概括了这本书的主旨。作为一本评论集，本书可视为李洱与文学界的一次对话。他写到了从汪曾祺到李宏伟等作家，写到了林建法等文学编辑，写到了贺绍俊、李敬泽等批评家，还写到了马尔克斯、昆德拉、博尔赫斯等人……作家、批评家、编辑以及古今中外文学资源，所有这一切拢括起来，正是构成文学史的诸种要素。其实，一切所谓“历史”，无非是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超高空飞行》可视为李洱的一部个体化的文学史书写。

当代文学史的“闭环”

李洱在书中说：“文学史是由作家、编辑、批评家共同建构起来的，缺一不可。他们带着自己的主体性进入公共空间，形成不同的对话关系，这个关系所形成的序列就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史。”书写这样一部在对话关系中涵括和呈现多样主体性的文学史，勾勒出文学活动从创作到出版乃至被阅读或消费的“闭环”，仿佛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百家品书

长期从事中国法律文化史和监察法制史研究的焦利新推出的《和坤的三年——清代监察大案启示录》以清代权臣和坤青年时期3年查办的3个轰动全国的贪腐大案为主线，展现了“肃贪者终成巨贪”的讽刺性蜕变。该书通过讲述3个大案中贪腐主角沦陷的过程和原因，以及案件对和坤的影响，揭示了他从“反贪”到“嗜贪”的心理和制度诱因。

不同于影视剧脸谱化的贪官形象，该书利用乾隆朝反贪案件的档案史料，还原了一个更真实立体的和坤——他青年有为，才华横溢，精通满、汉、蒙、藏4种语言，曾是乾隆皇帝倚重的能臣。书中详细描写了原本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和坤，在查办几个重要贪腐大案后，人生轨迹如何发生重大转变。作者通过3起大案，展现了和坤“屠龙者如何变成恶龙”的心路历程。

甘肃冒赈贪腐案中身处以绞刑的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是书中最令人痛心的人物。他勤谨有才干，正直富智慧，在接替王亶望担任



读作家巴陵锋的散文集《笔尖上的芭蕾》时，我脑海里不时会复现电影《人生》中高加林说出“我们用案件在大地上写下了无数的诗行”这句对白时的表情。高加林不怎么喜欢在村子里劳动，也不擅长劳动。但巴陵锋不一样。他在书写青少年时代与同为乡村知识分子的父亲一起田间劳作的种种情形时，笔下无不洋溢着对乡村生活源自深入的了解的热爱。他熟悉田间劳作的操作流程，几乎能够胜任绝大多数农活。尽管他也很想离开乡村，但在还没有机会离开的时候，无论是在养蜂、收麦时，在春节期间和乡亲们一起燃放炮仗时，在冻

在对话中勾勒文学史

——评李洱新著《超高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

□胡一峰

朱光潜先生曾说：“不通一艺莫谈艺”。好厨子历来是好食客。回顾历史，我国老一辈著名作家中本不乏评论家，文学史上有定论的“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位都是文艺理论评论大家，后三位的文艺论说的深刻切实也不输于专业评论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与批评家一身二任，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传统，也是推动中国文学创作前行的动力机制。在李洱这本书里，这种传统得到了延续和发扬。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李洱曾于2019年凭《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从作家的角度看作家、看批评家，更易获得反观或内省的洞见。在《因为欣赏，所以批评——浅谈贺绍俊先生》中，李洱列举了贺绍俊对铁凝、莫言、阿来等人的评论，指出贺绍俊的文学批评注重人论世，进而提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立足文本、参照人世，由人而文、由本及世，从而相互参照、相互阐发，进而找出其合理性，发现其审美特点，本是中国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正道，岂可轻易丢掉？”通读全书，你会感到，这也是李洱持批评之笔时的夫子自道。

他对作家的评论常遵循在“参照”中“阐发”的思路。在《汪曾祺的语言是革命性的》中，李洱认为汪曾祺的写作具有革命意义，“这说的还是他的语言。放在新文学和新时代文学的传统中，他用口语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意味着他在给汉语‘松绑’。他要回到诚实的个人，回到真切的语气，回到世俗的烟火，回到一个老百姓的位置。”在《关于莫言的“看”与“被看”》中，李洱提出：“莫言的小说，是对鲁迅开创的叙事模式、‘十七年’叙事模式以及新时期以来小说中所隐含的‘看’与‘被看’模式的重大改造……到了莫言这里，‘被看者’才开始真正发声。”在《邱华栋与他的小说》中，李洱以城市书写的角度将邱华栋界定为“最有力的开拓者”：“在邱华栋之前，即便描述的是中国都市，中国的城市小说也总是带着乡土背景下的城镇小说的味道。有趣的是，中国以前所有描述城市的作品，不管

是诗歌还是小说，几乎都显示出对城市的拒绝和反叛。”邱华栋则“用小说家的目光宽恕了罪，并把它看成是城市活力的某种证词”。这些观点，在评价作家的同时提供了观察的坐标，既完成了专业的批评，又营造了文学意义上的“对话”场域，引导我们更深入地阅读和理解作家与作品。

一份“批评文学”的范本

文艺理论家黄药眠曾提出，“文学批评最好能变成批评文学，有风格和华采”。李洱这本书里收录的文章，即可归于黄先生所期待的“批评文学”，自有其“风格和华采”。且看几段精彩的论述，他写张洁：“在波峰浪谷之间奔涌，时而撒欢，时而撒泼；时而凉爽宜人，时而悲凉彻骨；时而高歌猛进地抒情，时而进退维谷地反讽，这是人到中年的张洁在小说中留给人的印象。”他写邱华栋：“如果说别人的小说写的是‘故事’，那么他的小说写的就是‘新事’；如果说别人写的是回忆中的失败，那么他写的就是征服中的快感；如果说别人写的是孤独，那么他写的就是大陆。”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被称为“评点体”，三言两语，与被评的文本在“共生”关系下融合成新文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便是一例。李洱在本书中也提到了评点体，并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批评资源，值得重新认识。他还认为，作家很适合做评点，如果评得好，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现代以来，文学评论渐向文章体演变，到如今，论文体已成为主要样式，而文体对于思想的束缚也渐渐显现。选择什么样的评论文体，根本的标准还在于思想能否得以自在表达。

在这一点上，《超高空飞行》亦给人启发。书中收录的文章，体裁多样，挥洒自如。其中，《致广寒：一个成熟的作家，会有自己的修辞》是书信体，作者以对谈的形式，将自己关于经验、风格等文学创作核心概念的看法，娓娓道来。其实，一问一答，最能发挥刺激思想、引发论说的功能。此篇对此作了生动体

现。《何为小说家的经验》和《从〈一千零一夜〉开始》这两篇则采取了语录箴言的形式。那些短小精悍、优美的文字闪烁着哲理的灵光：“哦，有多少艺术的秘密，潜形于轻柔的灯烟。油灯在黑暗中闪烁，它突出了黑暗和光明，强调着时间的有限与永恒。你多么怀念油灯下的阅读，它把你一次次拽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满足。”

发掘作品背后的世界

李洱在《超高空飞行》中尽情地穿梭于作家作品之中，他的品鉴鉴赏却不是“饕餮”式的，相反，他以一个学者的目光寻幽探幽，努力勾勒隐藏在作品之后的思想地图或美学谱系。比如，十分见“功力”的《从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说起》。这篇文章源于李洱在2020年8月16日“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系列专题论坛”上的演讲。文章从李辰冬其人其事讲起，纵横捭阖，串联起红学史的重要关节，归结至比较文学的主题，进而勾勒《红楼梦》走向经典之路，读来十分酣畅。该文认为，“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可以说是王国维之后，最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之一”。作者还指出，李辰冬的研究或批评具有综合性，他把中国的评点批评与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的索隐批评等综合在一起，形成了跨学科研究的效能。“如果不是李辰冬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史上进行定位，影响到很多红学家的看法，再进行反复阐释，《红楼梦》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经典。”

在梳理红学史过程中，李洱发现，俞平伯、胡适等开新红学山门的大师对《红楼梦》艺术成就的评价其实并不算高，他对此作出了解释：俞平伯等人与《红楼梦》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内部，既无法感受到陌生性，又不具备对这个文化的反叛性。《红楼梦》则是以否定的形式，陌生化、批判性地全面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熟悉的陌生感”，恰是伟大作品的特征。

（作者系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读师力斌的文学评论集《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书写》时，突然想起了黑格尔的一个非常有启发的说法：熟知非真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说：“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熟知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和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的了，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联想，是因为师力斌的评论集真切地反映了熟知与真知的辩证关系。黑格尔并非反对熟知，而是反对沉溺于熟知而不自知，影响向真知跃迁，即熟知只是认识的第一步，真知才是认识的更高阶段。师力斌的评论集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认知的跃迁过程，而他能够实现这种跃迁，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对诗歌、文学的热爱。

□鲁太光

由熟知而真知——读师力斌《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书写》有感

我是师力斌的老同学、老朋友。2001年春天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参加硕士研究生复试时，我们俩一见如故，那时他就体现了这种热爱。在短暂地交流中，我知道他那时在太原的某单位工作，就是因为热爱诗歌、文学，才辞职报考北大中文系。我们俩有幸被录取成为同学后，他的这种热爱体现得更充分了，见面不久，他就把自己诗集打印本送给我，请我“指正”。同学3年，他跟我谈的最多的，就是他自己的诗歌和诗歌理想。毕业后，见面机会相对少了，但一见面，他谈的还是自己的诗歌和诗歌理想。20多年过去，他的热情不但始终如一，而且日益炽烈，谈论的焦点也更加集中了，那就是杜甫及其诗歌。熟悉的朋友都知道，一起聚会时，他的保留节目就是背诵杜甫的诗歌。当然，他不是为喜欢而喜欢，他是在杜甫中看到了理想的诗人形象与诗歌形态，故借杜甫谈新诗道路、新诗理想，这都凝结在他的专著《杜甫与新诗》中了。这部评论集中也有两篇专论杜甫诗歌对当下诗歌启示的文章，可供我们窥斑见豹。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书写》，师力斌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25年5月

正是由于热爱，使他熟知诗歌，特别是中国诗歌，而且他还由熟知而真知，达成了探究真知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就像他在《如何评价新诗大众化》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讨论新诗需要相当多“专业化的要求”，“它需要讨论者对百年新诗的阅读史，需要对诗歌史史实的掌握，需要诗歌理论的储备，甚至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诗歌写作训练”。

正是由于由熟知而真知，他提出了一些极具价值的见解和观点。比如，他的《新诗如何取标题》一文，不但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新诗标题的重要性、新诗标题的类别、新诗标题的要求，而且通过标题探查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颇有见地。他的《新诗的音乐性及形式创造》一文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好诗不一定非要音乐性，音乐性不等于格律。好诗不能单纯依赖某一种形式或技巧”。再如，他认为格律论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以格律为核心，期待一种定型化的音乐性模式，其结果只能是走向新诗自由的对立面”。这些论断看似聚焦于具体的诗歌问题，其实关联着新诗道路的大是大非，所以，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却蕴藏着作者长期的苦思，很有分量。

这部评论集中，对我启发最大的一点是作者对新诗大众化评价标准的构建。我个人认为，诗歌界之所以长期存在话题多、争议多而真正建设性理论观点较少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清晰且具共识的大众化评价标准，这也正是师力斌多年来深感忧虑的根由。为此，师力斌提出一种辩证的思维，“既在文化上全面考量新诗大众化的成就，也在审美专业上认真面对新诗写作的问题”，并依据这个总的原则提出三条标准：“首先，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应当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正视新诗能量，考量其成就”，这样新诗大众化在文化民主、文化公平等方面的贡献就不会被忽视乃至无视。“其次，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要区分大众化和专业化两个问题”，这样，诗歌的文化功能问题与美学标准问题就得得以呈现，“诗”和“好诗”得以区分，可以相对有效地解决讨论中盲人摸象、各执一词的问题。“再次，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的成就，既需要平等民主的文化态度，还需要广博精深的眼光”，这样，就可以避免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等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问题，中国新诗的“历史想象力”得以确立。

师力斌不但这样思考，而且也这样实践。在这部评论集中有鲜明的体现。他长期关注“北漂诗歌”，编选诗集、撰写评论、力推力荐，一个核心动因是关注中国新诗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关注这些不被注意的诗人诗作中蕴含的文化潜能、社会潜能、美学潜能，期待通过这样的努力拓宽中国新诗的河床，让中国新诗能万流竞奔。他对杜甫念兹在兹，对一些经典诗歌如数家珍，是因为他既在其中获得了美的享受，又在其中看到了“好诗”的精髓、写“好诗”的历程。

这两者，一则大众化，一则专业化，看似南辕北辙，但在师力斌笔下却十分自治、自如，这得益于他的“辩证思维”。其实，大众化与专业化又何尝不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恰恰相反，专业化的写作常常需要大众化的养育，大众化的潮流拓宽专业化的河床。”

往深处看，师力斌讨论的不仅是新诗大众化的标准问题，更是文艺民主化和美学专业化的对立统一问题。一般而言，文艺民主化作为美学专业化创造环境、培育土壤，而美学专业化则拓展文艺民主化的维度、途径和方式方法，二者虽是分野，却彼此依傍、互促共进。明了这个问题，守住这个原则，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书写方可百家争鸣。我以为，这就是师力斌在这部评论集中奉献给我们的文学真知。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从清官到贪腐者的历史警示

□李萍

甘肃布政使前，不仅清正廉洁，还政绩显著——平反冤狱、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推广文化，百姓在其治下安居乐业。如今甘肃定西的“王公桥”，正是当地百姓对这位“清官”的赞誉与纪念。然而，这样一位能臣最终却被贪腐浊流吞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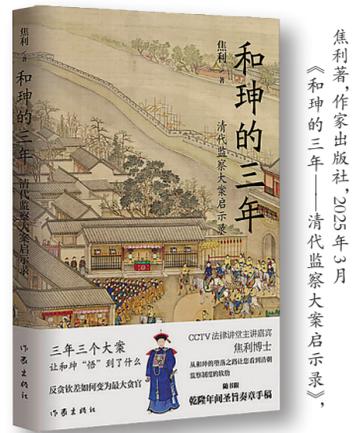
查办王廷赞的，竟是曾被和坤查处的大贪官李侍尧。这位贪腐3.5万两的巨贪，因皇帝宠信免于死罪，反成查办王廷赞的钦差大臣，甚至跻身紫光阁功臣之列。反观王廷赞，贪腐2万两却被判绞刑。前者从巨贪转为“反贪大将”，后者从清官沦为“腐败分子”，两人命运的强烈反差，深深触动了参与两案查办的和坤。他由此滋生“只要讨好皇帝，贪腐便可豁免”的念头，为日后堕落埋下伏笔。

李侍尧与王廷赞的经历，深刻揭示了缺乏民主监督的“以官察官”制度的局限性。在“人多势众，挟势乱为”的官场歪风中，王廷赞虽有为民初心、出众才干，却在威胁、孤立与

劝诱中妥协随俗，最终从清官沦为贪官，落得绞刑下场。这一悲剧并非个例——在腐朽的制度框架下，无数“王廷赞”被挤压进贪腐的窄笼，被迫同流合污。王廷赞的结局不仅令人扼腕，更让年轻的和坤对“清官之路”失去信心，加速了其价值观的崩塌。

好人的信心比黄金珍贵，保护清官需好制度与有效执行。当正直者遭流言打压时，制度应及时给予光明与信心。同时，潜在好人身边需有诤友，如“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益友。王廷赞动摇时，下属劝其“识时务”，若身边有格局宏阔的朋友，其结局或许不同。合群需以作奸犯科为代价，独处反而是解脱。“意静不随流水转”，人生方向应基于智慧与实干，而非他人左右。可惜王廷赞与和坤皆缺乏这股定力。

以史为鉴，大清官场“潜规则”引人反思。王廷赞与和坤，一个清廉有才干，一个才华出众，却因外部缺乏制度保障与诤友提醒，内部缺少定力，最终走向悲剧。作者在日记



焦利新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3月

中提出：清代监察法虽立法完备，却困于“以官察官”窠臼，缺乏公众参与，终致“官官相护”。这是对封建皇权下制度缺陷的深刻批判——没有民主政治，便无充分监督，再好的法律也难抵权力腐败。这段历史警示我们，制度护航与自我定力，是守护正义的双轨。（作者系最高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

《笔尖上的芭蕾》：

全情雕刻乡土时光

□裴亚莉

腊八炖肘；还是在做着明知不妥，却因乡民普遍如此而随大流“砍树”时，他从来没有将自己排除于乡村生活。这正是《笔尖上的芭蕾》书写乡村生活时的珍贵所在。

这种全然沉浸其中的经验，使得巴陵锋在书写乡村生活时，能够复现生产过程的完整、细致与真实，同时饱含对农民命运和农事的关切。在《陇东场活》一文中，作者记录了“夏收的辛苦深入骨髓”的经验：从收麦到碾场、翻场、扬场，这些全在烈日下进行的劳作，虽意味着从去年秋种到今年夏收约9个月劳作的最终收获，却在辛苦中弥漫着丰收的快意……但兴致勃勃的夏收也会遭遇“塌场”，若遇上连阴雨，更是如同“天杀人”——唯有熟练农事的人，才会记得这些扎心扎肺的“农事专业术语”。无论是辛苦还是豪迈，无论是怨天尤人还是顺顺利利颗粒归仓，没有经历过此番情景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乡村生活里的日常场所与内容，或许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风景”，但写作者不能仅

停留在安心欣赏眼前美景的层面。少年巴陵锋“家里养过蜂，最少时一窝多时八九窝”。与我们熟悉的诗人和蜜蜂之间的审美距离不同，巴陵锋与蜜蜂的距离是“春夏秋冬蜜蜂盘旋头顶，嗡嗡声不绝于耳，经常爬进人脖子、窜遍周身。父亲是个养蜂好手，我对养蜂、割蜜、护蜂喂蜂等事宜，也是样样通晓……”《养蜂记》里的生动描述，当然少不了被蜂螫的场景。这让只在经典诗文中欣赏过蜜蜂而在实际生活中害怕蜜蜂的读者，足以大开眼界。

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热爱乡村，巴陵锋的精神底色深植于乡村，因而除了深度参与乡村生产劳动，他也深度体验并享受过乡村古老风俗：燎疖、冻腊八块，在欣欣然迎接春天时和大人一起制作音色嘹亮的柳木号——这一过程凝结着作者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永恒热爱。作者在段落中毫不犹豫地用方言描述制作柳木号的过程，一个兼摹拟声和和声的“喳”字，尽显孩子们等待大人扭柳皮时的

急切之情。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用到“救咪咪”这个字眼。这个词不仅表露了他对童年词汇的钟情，更显现出对语言与记忆之间特殊关系的执拗留存。这使得对制作柳木号过程的书写，不仅是对自然馈赠的玩具制作过程的记录，更是对作者浸润其中的乡村文化的生命力与整体性。

在我国文学史上，写农事的作品浩如烟海。从《诗经》中的《七月》《伐檀》到《劝农》《悯农》，再到《创业史》《人生》《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知识分子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关注、同情，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巴陵锋的不同，在于《笔尖上的芭蕾》所写的生活，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北方乡村大踏步走在希望田野上的生活。它既是一份对乡村生活的情感表白，也是对面临农业科技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历史时刻的史学记录，因而既有很好的艺术鉴赏性，也具备一定的社会价值。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